

## 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作的生产、流通与消费

杨 鹏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有清一代,尤其是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的稻作农业发展迅速,在分布、品种、技术、流通及消费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水稻种植主要集中于湘西南和黔东南地区,其他地区亦有一定的种植。水稻品种共计295个,以籼、粳稻为主,糯稻为辅,籼稻分布最广,粳稻主要分布于部分高海拔地区,糯稻则主要分布于苗族和侗族聚居区。随着稻作生产的发展,围绕选种育种、耕田整地、育秧移栽等环节形成了一套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稻作生产技术体系。在稻米流通及消费方面,稻米流通主要有丰歉互济、贡奉朝廷、米谷贸易等方式,稻米消费地理分布不平衡,并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性差异。

**【关键词】**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作技术;稻米流通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3-0028-10

##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Rice in Wuling Ethnic Minority Area in Qing Dynasty

YANG Peng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after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the rice farming agriculture in Wuling ethnic minority area developed rapidly, with remarkable changes in distribution, varieties, technology,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showing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Rice planting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Hunan and the northeast of Guizhou, and other areas had a certain planting area. There were 295 rice varieties, mainly indica rice and Japonica rice, supplemented by glutinous rice, indica rice was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japonica rice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me high-altitude areas, and glutinous rice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Miao and Dong ethnic area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ice production, a set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ice production technology system had been formed around seed selection and breeding, tilling and transplanting. In terms of rice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rice circulation mainly consisted of mutual aid, tribute to the court, rice and grain trade, etc.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rice consumption was unbalanced, and showed obvious class difference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Wuling ethnic minority area;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rice circulation

武陵民族地区位于我国中西接合部,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地跨湘鄂渝黔四省(市),面积达10万多平

**【收稿日期】**2023-0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武陵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格局研究”(20XMZ033);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武陵山区川菜饮食文化资源产业化与少数民族乡村振兴发展研究”(CC18G16);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科研项目“张宗法农学思想研究”(SXJZX2022-004)

**【作者简介】**杨 鹏(1994-),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方公里,人口2000多万,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历史上,武陵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山地农耕文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清时期武陵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做了诸多研究,李幹、段超、邓辉、朱圣钟、郗玉松、莫代山等学者分别就农业经济、农业结构、作物分布以及外来作物的推广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做过积极探索<sup>①</sup>,但对这一时期的稻作生产、流通与消费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武陵民族地区拥有悠久的水稻栽培历史,根据考古发现,湘西北的石门皂市下层早期遗址曾出土稻谷遗存<sup>②</sup>,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武陵民族地区就出现了稻作生产。一般认为,清代改土归流后,玉米等美洲粮食作物在武陵民族地区广泛推广,取代麦、荞、豆等杂粮成为首要粮食作物和主食。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稻作生产亦发展迅速,稻作面积逐步扩大,品种大为丰富,产量大幅提高,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稻作技术与稻作文化。本文拟从稻作地域分布、水稻品种分布、稻作生产技术、水稻流通与消费等方面切入,深入探讨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的稻作生产、流通与消费,以期丰富和推动明清时期我国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农业史和社会发展史研究。

## 一、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作的地域分布

武陵民族地区山高林密,溪流纵横,峡谷幽深,水稻主要分布于海拔1200米以下山间盆地、河谷平坝之中。清代改土归流后,大量外来移民涌入,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流官鼓励开荒垦田,水稻种植面积较改土归流前大幅增加。改土归流初,水稻主要种植在低山坪地和河谷平坝,到清代后期,逐渐扩展至二高山山间盆地近水源之处。从地域分布来看,清代武陵民族地区各地水稻分布情况差异较大。

湘西地区水稻主要分布于辰州府、沅州府、靖州、澧州、晃州厅、乾州厅、永绥厅、凤凰厅、永顺府。据相关方志资料统计,清代辰州府所属沅陵、泸溪、辰溪、溆浦四县,水田比重分别为67.6%、73.9%、83%和93.5%<sup>③</sup>。其中溆浦县为辰州稻米主产区,除自给外,尚有输出。民国《溆浦县志》载,“嘉庆来,每年额运绥靖、永绥二镇协兵米三千一百六十五石零五升,闰年加解米二百六十九石二斗一升”<sup>④</sup>。沅州府所属黔阳、麻阳、芷江三县,水田比重较辰州府更大,分别为89.3%、90.4%和95.5%<sup>⑤</sup>。同治《沅州府志》记载“谷之属”时,将稻列在首位,足见其重要性。沅州府属黔阳县“多山居,所谓鱼利无几焉,而物产之宜,则有可记者。谷之属为稻,凡数十种”<sup>⑥</sup>。晃州厅、靖州水田比重分别为94.5%和95.7%<sup>⑦</sup>,稻作在农业生产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改土归流后,湘西苗疆凤凰、永绥、乾州三厅水稻种植有所扩展,到乾隆时“稻田计亩收谷,赢内一倍”<sup>⑧</sup>,但总体而言,苗疆三厅水田面积远不及旱地,水田比重小。旱粮仍为苗疆三厅最

① 相关研究如李幹、周祉征、李倩:《土家族经济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段超:《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段超:《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邓辉:《土家族区域经济发展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朱圣钟:《区域经济与空间过程:土家族地区历史经济地理规律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郗玉松:《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移民与玉米引种》,《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莫代山:《清代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的玉米种植及其社会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② 老矣:《长江中游新石器早期遗存农业初探》,《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③ 参见同治《沅陵县志》卷10《赋役》,同治十二年刻本、道光《辰溪县志》卷7《田赋志》,乾隆《溆浦县志》卷8《赋役》,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乾隆《泸溪县志》卷10《赋役》,乾隆十六年刻本。

④ 民国《溆浦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63)》,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⑤ 参见同治《黔阳县志》卷14《田赋》,同治十三年刻本、同治《新修麻阳县志》卷3《田赋》,同治十三年刻本、同治《芷江县志》卷8《田赋志》,同治九年刻本。

⑥ 同治《黔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61)》,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8页。

⑦ 参见道光《晃州厅志》卷13《田赋》,道光五年刻本、光绪《靖州直隶州志》卷4《贡赋》,光绪五年刻本。

⑧ [清]严如煜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严如煜集(2)》,岳麓书社,2013年,第830页。

主要的粮食作物,“苗地山多田少,稻谷无几,俱种杂粮于山坡,包谷为最”<sup>①</sup>。永顺府“郡地多山少田,土寒水冷,树艺无法,稻谷不蕃”<sup>②</sup>。澧州永定县、大庸县盛产水稻,永定居民“食以稻为主,率多精凿”<sup>③</sup>,永顺府所需稻米皆“仰给永定卫、大庸所两处”<sup>④</sup>。

鄂西南地区的施南府和宜昌府皆有水稻种植,主要分布于施南府利川县、来凤县、宣恩县、恩施县、咸丰县、建始县、鹤峰州、长阳县、长乐县、巴东县等地。利川为高山平原,地势相对平坦,在二高山地区分布有大量山间盆地,低山地区则分布有众多河谷和平坝,出产水稻,素有“银利川”之称。光绪《利川县志》称利川“地广物饶,为施郡冠,其可纪者,于谷则稻,凡二种,曰糯、曰秈,各数十种”<sup>⑤</sup>。利川还产香稻,以产于支罗的“支罗米”最为知名。改土归流初,施南府宣恩县清丈土地,勘出“水田二百一十顷四十五亩,旱地一百九十一顷五十八亩”<sup>⑥</sup>。水田占耕地面积比重52.4%,旱地占耕地面积比重47.6%,可见宣恩县水旱并重,水田略多于旱地,稻作播种面积必然大于旱粮。改土归流后,来凤县“山行平旷处,皆开田种稻”<sup>⑦</sup>,乾隆三年(1738)勘出“水旱田地共五百七十一顷六十三亩”,其中“水田二百八十一顷七十八亩;旱田一百三十四顷六十一亩;旱地一百五十五顷二十四亩”<sup>⑧</sup>。水田、旱田、旱地分别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9.3%、23.5%和27.2%,稻作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近一半,说明水稻为来凤县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长阳县、鹤峰州等地水稻种植亦有较大发展,如乾隆时期长阳县令劝民广开水田,“凡有水道可引平坦地方,悉行开挖,改旱为水,播种稻谷”<sup>⑨</sup>,形成了以枝柘坪、磨市、榔坪等地为主的稻米产区。改土归流后,鹤峰州山羊隘“今水田遍野”<sup>⑩</sup>,水稻产量有一定提高。但整体来看,除利川、来凤、宣恩三县外,鄂西南地区其他州县水田比重均在20%以下,如长阳县为14.1%,巴东县为0.1%<sup>⑪</sup>,绝大多数州县为“半种山坡半力田”<sup>⑫</sup>,“平田可种稻者甚少”<sup>⑬</sup>,水田甚少故产稻不多,居民“食米者十之一耳”<sup>⑭</sup>。

渝东南地区水稻主要分布于黔江县和石柱厅,酉阳州、彭水县、秀山县间有种植。水稻是黔江县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当地居民以稻米为主食,“民食稻米而外,包谷为大宗”<sup>⑮</sup>。石柱厅“土人惟食稻,且惟知艺水稻……岁计收成,分数包谷为水稻之辅也。”<sup>⑯</sup>酉阳州“后溪、龙筹诸处颇有水浇灌”,其他地区“俱高山中,种包谷、粳子各杂粮”<sup>⑰</sup>。秀山县、彭水县有少量平地水田种稻,产量较少,居民以玉米、番薯等杂粮为主食。如彭水县“境内山多田少,近水平陆处可种植粳稻”<sup>⑱</sup>。

黔东北地区水稻主要分布于思南府、思州府、松桃厅、石阡府、铜仁府。思南府食粮以稻米为主,水

① 道光《凤凰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72)》,第205页。

② 同治《永顺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68)》,第357页。

③ 同治《续修永定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71)》,第356页。

④ 乾隆《永顺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69)》,第131页。

⑤ 光绪《利川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8)》,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⑥ 同治《增修施南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5)》,第203-204页。

⑦ 同治《来凤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7)》,第463页。

⑧ 同治《来凤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7)》,第374-375页。

⑨ 乾隆《长阳县志》,《故宫珍本丛刊:湖北府州县志(13)》,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⑩ 鹤峰山羊隘:《向氏族谱》,转自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内部资料),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印刷,1986年,第93页。

⑪ 龚胜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⑫ 同治《咸丰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7)》,第119页。

⑬ 同治《宜昌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49)》,第424页。

⑭ 道光《建始县志》卷3《食货志》,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⑮ 光绪《黔江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22)》,巴蜀书社,2017年,第715页。

⑯ 道光《补辑石柱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21)》,第34页。

⑰ [清]严如煜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严如煜集(2)》,第585页。

⑱ 光绪《彭水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23)》,第192页。



稻被当地人称之为“大谷”，“农家稻居其七、麦居其三”<sup>①</sup>。思南府属印江县“无特产也，惟大石墩山麓之稻，米白而香，甲于思郡。”<sup>②</sup>思州府所产稻米，除供给本地以外，尚有余额以供外运，“奉文采买凑供挽运铜仁，转运松桃石岷备支米一千三百九十一石八斗”<sup>③</sup>。松桃厅“地宜稻”，北与湘西永绥厅接壤，永绥缺粮时，“松桃民挑至集场发卖……两厅之民得其便”<sup>④</sup>。石阡府“全境之中田土各半，田宜稻麦。”<sup>⑤</sup>铜仁府的水稻种植亦有一定发展，到光绪时期水稻品种已达四十余种<sup>⑥</sup>。

## 二、清代武陵民族地区水稻品种资源及其分布

清初，武陵民族地区水稻品种较少，改土归流后，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武陵民族地区引进了许多水稻新品种，水稻品种大为增加。据笔者统计，清代武陵民族地区地方志中有明确名称的水稻品种有295个（表1），其中以水稻外观命名的有147个，以稻米香味命名的有10个，以水稻产地命名的有44个，以水稻生长收获时间命名的有43个，以适宜土性命名的有12个，综合命名的有39个。

古人将水稻分为粳、粳、糯三类，元代农学家王祯曾说：“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概为类有三：早熟而紧细者曰粳，晚熟而香润者曰粳，早晚适中、米白而黏者曰糯”<sup>⑦</sup>。清代时，武陵农人在此基础上对当地稻种资源进行分类和命名，其中以水稻外观命名的稻种占全部稻种的近一半，说明其对水稻的茎、叶、芒、穗型、谷壳等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总结。除外观外，武陵农人还会根据水稻的适宜土性、香味程度、产地来源、栽培制度和生育期等为其命名。可见清代武陵地区各族人民对水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通过对清代武陵民族地区水稻品种资源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从水稻的种类来看，以粳、粳稻为主，共181个品种，占61.35%；糯稻为辅，共114个品种，占38.65%。其二，从稻种数量变化趋势来看，清代武陵民族地区地方稻种的品种数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以湘西南靖州为例，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靖州志》在物产卷中记载有稻，但是并未记载水稻的种类与品种，可见当时的水稻品种数量较少；半个多世纪后，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靖州志》记载17个水稻品种；一百多年后，光绪五年（1879）的《直隶靖州志》记载29个水稻品种<sup>⑧</sup>，较乾隆年间增加了12个。从增长的趋势来看，清代改土归流后的乾嘉时期水稻品种数量增幅最大，以凤凰地区为例，康熙四十三年（1704）清政府镇压苗人之后，裁撤土司，增设凤凰厅，乾隆二十一年（1756）所修厅志仅记载4个水稻品种，到道光四年（1824）再修厅志时，水稻品种增至23个<sup>⑨</sup>，增加了4.75倍。其三，从水稻的收获时间来看，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的水稻品种有早、中、晚稻之别。如辰州府“谷有早、中、晚之分”<sup>⑩</sup>，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沅州府志》亦记载47个粳稻品种，其中早稻14个，中稻16个，晚稻17个<sup>⑪</sup>。早、中、晚稻的播种和收获时间有所不同，乾隆《湖南通志》载：“早者二月中播种，三月插秧，六月末可获，惟高田为宜；中稻则清明前播种，处暑后可获；其最晚者名重阳糯，九月始收，惟下湿田宜之”<sup>⑫</sup>。

① 道光《思南府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46）》，巴蜀书社，2016年，第50页。

② 道光《印江县志》，《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③ 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2页。

④ [清]严如煜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严如煜集（2）》，第584页。

⑤ 民国《石阡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47）》，巴蜀书社，2016年，第446页。

⑥ 光绪《铜仁府志》卷7《物产》，光绪十八年刻本。

⑦ [元]王祯：《农书（上）》，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8页。

⑧ 光绪《直隶靖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64）》，第472页。

⑨ 道光《凤凰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72）》，第290页。

⑩ 乾隆《辰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59）》，第281页。

⑪ 乾隆《沅州府志》卷24《物产》，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⑫ 乾隆《湖南通志》卷49《风俗》，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表1 清代武陵民族地区水稻品种资源		
命名方式	粳、梗稻	糯稻
根据外观命名	大白粘、观音谷、黄粘、白粘、黑粘、红粘、白连稻、马尾粘、青粘、黄瓜早、白脚粘、托粘、油粘、齐粘、白粳稻、红粳稻、黄粘、团禾、红脚早、大叶粘、马尾粘、马尾占、黄泥粘、红脚占、齐头黄、齐头占、岩粘、金粘、大小齐粘、坨粘、马尾粘、大叶粘、青粘粘、筒子粘、金包银、白云粘、红莲稻、白米粘、乌米粘、银茎粘、青藁粘、佛子粘、黄平粘、黄瓜粘、芭茅粘、白壳粘、矮麻粘、银谷占、五开占、青梗占、瓜占、夺碓占、青谷占、细叶粘、蚌珠粘、洗把早、盖草粘、杉板红、乌脚粘、旗粘、洗把粘、火焰粘、麻壳粘、汉麻粘、飞鹅粘、至笨粘、大南粘、乌梢粘、半边粘、大谷粘、三穗子	三颗寸、糯粟谷、红糯谷、白糯谷、长壳糯、花壳糯、白糯、占谷糯、硃砂糯、毛班子、长糯、光顾糯、红脚糯、银茎糯、丝茅糯、矮糯、九除糯、马尾糯、岩子糯、飞蛾糯、花糯、柳条糯、红糯、高脚糯、矮脚糯、岩儿糯、九垂糯、朝山糯、黑节糯、迟红壳糯、鸡打望、扫箕糯、光头糯、李子糯、马眼糯、白谷糯、绵花糯、黄须糯、锡皮糯、刷箕糯、鸡爪糯、白鬃糯、红须糯、稠糯、黄匾糯、矮筒禾、猪毛糯、刷帚糯、牛虱糯、日寸谷糯、红壳糯、白壳糯、寸金糯、白金糯、半边糯、粽子糯、扫帚糯、竹丫糯、金钗糯、黄丝糯、灰包糯、杯杯糯、白果糯、白杨糯、寸米糯、响壳糯、羊毛糯、樱桃糯、折子糯、矮子糯、亡人糯、寸谷糯、泡桐糯、杉木红、牛皮糯、鱼子糯
根据适宜土性命名	冰水稻、溢寨稻、旱禾、旱稻、冷水粘、旱谷、北风粘、旱粘、冷水谷、旱稻谷	旱糯、冷水糯
根据产地命名	桂阳粘、贵阳粘、云南粘、种禾稻、桂阳粘、迟江西早、云南粘、思南粘、思南早、桃源早、南早、施南早、云南白、贵阳粘、京粘、麻粘、西阳粘、支罗杭、鄖阳粘、龙里粘、云阳粘、陇里粘、五开粘、峒麻粘、陇里粘、麻占、京占、垄里占、南京粘、苗占、高山早、云南占、龙阳占、贵东粘、云阳白	桂阳糯、陈阳糯、山阴糯、西阳糯、种禾糯、四乡禾、阴山糯、都匀糯、江西糯
根据生长收获时间命名	百日早、洗把早、晚稻、齐头黄、百日早、五十日早、六十日早、麻早、百日粘、洗把早、早粘、早粘、白早、红早、麻早、百日早、过冬青、龙羹早、二黄早、七十早、未伏早、早谷、二发早、百早粘、汉粘、七十粘、早川粘、迟川粘、白露早、茅香早、百日黄、早黄、迟黄、迟谷	百日糯、八月糯、糯谷、早禾糯、迟禾糯、冬粒糯、冬粘糯、早糯、早日糯
根据香味命名	香梗稻、香稻、香稻米、香禾米、香米粘、毛香晚	香黍糯、香糯、香梗糯、七里香
综合命名	黄金铃、苘禾、沙占、火烧粘、沙粘、油粘、嘉稻、沙粘、贵样粘、蔬粘、富贵粘、羞粘、苏谷粘、打谷粘、毛油粘、盖草占、油占、懒打占、救公占、油口粘、恋岩粘、懒担淤、撒苗、粘粟谷、一丘水	油粘糯、摘糯、猪油糯、半粘糯、团糯、铁脚糯、团头糯、岩糯、油糯、白沙糯、粘禾糯、岩仔糯、打谷糯、班稠糯

资料来源：武陵民族地区清代各府州厅县志书。

与清代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武陵民族地区水稻品种资源的地域特点更为明显。包括太湖地区在内的江南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以稻作为核心的农业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与太湖地区相比，武陵民族地区的水稻品种资源具有数量较少、优质稻种少、生长期较长、播种和收获时间晚等特点。其一，从水稻品种数量来看，太湖地区土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仅为武陵地区的三分之一，但清代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高达380个<sup>①</sup>，品种数量远远超过武陵地区。其二，从优质水稻数量和种类来看，清代太湖地区种植的优质水稻品种高达40个<sup>②</sup>，类型丰富，包括芳香类、柔软类、洁白类等6种类型，而武陵地区的优质水稻品种不过10余个，类型以芳香类为主，类型较为单一。地方稻种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稻作生产的发展状况，由上可见，尽管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的稻作生产取得较大发展，但受

① 殷志华：《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稻作史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68页。

②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编著：《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21-123页。

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条件制约,仍滞后于太湖地区。其三,从水稻的生育期来看,由于武陵民族地区地处山区,气候较寒,暖期较短,因此水稻生育期较长,播种和收获时间都晚于太湖地区。清代太湖地区早稻“五月而种,七月而熟”<sup>①</sup>,而武陵地区早稻则为四月种,八月收。据《楚南苗志》记载:“洗耙早、麻粘、虾公粘,以上早稻,四月种,八月收。盖内地所谓中稻,即苗疆之早稻也。”<sup>②</sup>

从水稻品种资源的地理分布来看,籼稻分布最广,广泛种植于武陵山区各地,尤其集中于鄂西南及黔东南地区,鄂西南所种之稻以籼稻和糯稻为主<sup>③</sup>,黔东南地区主要种植籼稻,这种稻作格局,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sup>④</sup>。粳稻主要分布于高海拔地区,如石碛厅“厅境山多田少,田宜粳稻”<sup>⑤</sup>,其主要产区集中于渝东南、湘西及鄂西南部分地区,包括渝东南的石碛厅、彭水县,湘西地区的沅州府、辰州府、乾州厅、永定县、龙山县、保靖县、辰溪县,鄂西南的鹤峰州、来凤县、利川县。糯稻主要分布于苗族、侗族聚居区,苗族和侗族都喜食糯食,正如《黔南识略》所说,“苗人惟食糯米”<sup>⑥</sup>,乾州厅是雍正时期开辟的苗疆三厅之一,同治十一年(1872)的《乾州厅志》中列有34个水稻品种,其中糯稻品种占二分之一<sup>⑦</sup>;湘西南的靖州是侗族主要聚居区之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靖州志》列有17个水稻品种,其中籼稻9个,糯稻8个,糯和籼近乎平分秋色,糯稻在稻作生产中之地位可见一斑<sup>⑧</sup>。

### 三、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作技术体系的发展

清代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汉族地区的农耕技术在武陵地区逐渐推广开来,同时,随着土家、苗、侗等民族的迁徙、流动和族际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武陵民族地区形成了一套极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就稻作栽培技术而言,包括选种、育种、整地、播种、移栽、中耕、施肥、灌溉等多个技术环节。武陵民族地区的稻作技术体系既吸收了汉族的农耕技术,又融合了土家、苗、侗等民族的传统农业知识,是武陵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

#### (一)选种育种

在选种育种时,武陵农人强调要不违农时,“春社浸种者,名社秧;清明浸种者,名清明秧。栽插不避风雨,恐违节气。谚曰:‘三月清明迟下种,二月清明早种秧。农家以此为占验’”<sup>⑨</sup>。土家族选种要求“颗粒粒像黄金,颗粒粒都饱满”<sup>⑩</sup>,不同的水稻品种选种要求有所不同,“黏谷选丘丘,糯谷选线线(穗)”<sup>⑪</sup>。在侗族聚居区,选种方法有穗选和块选两种,又以穗选居多<sup>⑫</sup>。

#### (二)耕田整地

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普遍推广牛耕,整田技术较前更为精细。耕田整地的首要工序是犁田,

① [清]姜皋:《浦沔农咨》,道光十四年刻本。

② 谢华著,伍新福校:《楚南苗志·湘西土司辑略》,岳麓书社,2008年,第47页。

③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恩施州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④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贵州农作物之改进》,《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研究丛刊农艺总志》1947年11月刊印,第2页。

⑤ 道光《补辑石碛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21)》,第35页。

⑥ 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⑦ 同治《乾州厅志》卷13《物产志》,转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王达等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一种·稻·下编》,农业出版社,1993年,第445-446页。

⑧ 乾隆《直隶靖州志》,《故宫珍本丛刊:湖南府州县志(16)》,第271页。

⑨ 同治《来凤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7)》,第463页。

⑩ 彭勃、彭继宽整理诠释:《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年,第218页。

⑪ 田荆贵主编:《中国土家族习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⑫ 向安强、张巨保:《侗族稻作农耕文化初探》,《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



将泥土耙碎后犁翻,再耙平,如此反复数遍。犁田时,要将田埂边上的泥土翻转过来;耙田时,则要泥土耙得平整、均匀。耕田平整好后,要灌水泡田,并注意检查田埂是否漏水。一旦发现漏水或者田埂坍塌,以瓦片堵住缺口,再用石块砌牢田埂。若田中泥土堆砌成堆,务必及时铲平。土家族《务农歌》唱道:“犁田靠绞边,耙田莫露尖。田埂搭瓦块,破口塞在先。三耙四犁到,水坐多几天。”<sup>①</sup>

### (三)育秧移栽

育秧方面,武陵农人尤为重视浸种催芽。浸种的时间,通常在惊蛰前或清明后,品种不同,又略有差异。浸种时,将稻种装入木桶,上盖稻草,“温水洒得细又匀,一天几次定时辰。桶子里面热气升,沉睡谷种已苏醒”<sup>②</sup>。稻种浸泡一般为三天,当稻种长出嫩芽后,即可撒入秧田。“惊蛰后农人以水浸稻,三日沥水覆草,又三日甲坼成芽,撒之田中”<sup>③</sup>。

水稻秧苗从秧田移植到稻田时,武陵民族地区就流传“开秧门”的习俗,即在插秧时,击锣鼓,唱秧歌,敬秧神,以庆祝移栽。如《长阳县志》载:“其插禾,先数日,人骑秧马,入秧田取秧,扎成大把。名秧把。插时将秧把散掷净田中,均匀分立,名‘梅花瓣’。男女同下田,各居一边,俱以年老者界其间,排成湾一字形,各取秧把,分插。皆伛偻以退为进,另二人击鼓锣唱秧歌亦退而走,鼓缓,插亦缓,鼓急,插亦急,名‘点藝’。横直成行为上藝,替换为接藝,一人太快上前,众人俱落后为勒藝。鼓锣繁促不唱,插者亦繁促不语,为催藝。插毕,彼此互邀饮食为洗泥,又曰洗犁。”<sup>④</sup>

插秧时间受水稻品种、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有所不同,一般在2月至4月间。《古丈坪厅志》载:“凡田下种栽秧,因地势而分,地土平坦,宜下清明种,地土高险,宜下谷雨种。早禾二月下种,八月可获。迟禾三月种,八月中可收。”<sup>⑤</sup>

插秧时,武陵农人注重“插灰秧”,即以草木灰掺和人畜粪、枯饼肥拌成泥状,运至田边,装入木盒或插秧船,每插一株秧苗前,须将秧苗根粘带一些肥,再一并插入田间,又称之为“插洛洛秧”。插秧规范上,土家族要求“一人插秧四行。边插边后退,我赶你也追。大田插秧先插角,棵对棵来行对行”<sup>⑥</sup>。湘西南侗族聚居区插秧则讲究快插,相互比试,且要求“扯直行”,即所有插秧者同时下田,每人插五行,行行直线<sup>⑦</sup>。

### (四)耘耥

清代武陵民族地区耘田以足耘为主,间有手耘。水稻插秧后,耘田要踩两次,踩头次翻泥透气,踩二次扯草除稗,谚云:“苗里一根草,犹如毒蛇咬;头道不薅要丢,二道不薅要歉收”<sup>⑧</sup>。又据《芷江县志》记载:“树艺之后,薅治不甚用力,农人连袂步于田中,以趾代锄,且行且拔。塍间击鼓为节,疾、徐、前、却,用是芜草皆净尽焉。”<sup>⑨</sup>在侗族聚居区,农民多用秧耙手耘薅草,一人一天可锄草一亩半。<sup>⑩</sup>改土归流后,区种法开始在一些地区推行,为促进水稻增产,流官要求农民在播种之后多次锄草,如鄂西南来凤知县丁周劝民“别制广一寸长柄小锄,锄多则糠薄,若锄至八遍,每谷一斗,得米八升”<sup>⑪</sup>。

① 晏晓明主编:《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卷》(内部资料),岑巩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印刷,1990年,第192页。

② 彭勃、彭继宽整理诠释:《摆手歌》,第218-219页。

③ 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22)》,第280页。

④ 道光《长阳县志》卷3《风俗志》,道光二年刻本。

⑤ 光绪《古丈坪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70)》,第402页。

⑥ 彭勃、彭继宽整理诠释:《摆手歌》,第236页。

⑦ 赵小鹏、杨文基、梁海鸥编:《湖南怀化民俗史料》,线装书局,2007年,第6页。

⑧ 永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顺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0页。

⑨ 同治《芷江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67)》,第422-423页。

⑩ 宋兆麟:《侗族的农具和耕作技术》,《中国农史》1983年第1期。

⑪ 同治《来凤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7)》,第517页。

### (五)灌溉

武陵地区山多地少,地貌多样,既有分布于河谷平坝的河边田、溪边田和冲边田,也有绕山而上的梯田及高山和部分二高山地区的望天田、雷响田,当地农民因地制宜,采取拦河筑坝、泉水引灌、筒车车水、开塘蓄水等多种灌溉方式。

拦河筑坝:河旁溪畔的稻田,若堤岸地势平坦,则开沟引水,节节筑堰,修筑水沟,使河水徐徐下注,以资灌溉各田。泉水引灌:引高处的泉水水源向低地供水,“岩谷之间,随地生泉,筑坝挑渠,上承下接,亦可灌田数亩及数十亩不等”<sup>①</sup>。但泉水温度低,不利于早稻生长,仅适宜晚稻使用。筒车车水:武陵民族地区山高坡陡,河流湍急,农户多在近岸的堤坝上架起水车,车水灌田。如鄂西南恩施县“于溪流近岸处,竖木为架,缚竹为大轮,以竹筒周缚轮外,口皆向上,置流水中,水激轮行,筒载其水,转旋而上,注于木视,由此递引入田。大约一具可灌田数十亩,较桔槔之制,尤为不劳人力。”<sup>②</sup>筑塘蓄水:在水源不足的地方,多筑起堰塘,积蓄雨水和泉水,灌溉稻田。修建时要先筑牢塘底,再建塘坝,使堰塘内水不能外渗。

### (六)施肥

改土归流后,流官颁布文告,教民“积粪和灰”“多收草粪”,革除“向来刀耕火种,不用灰粪”之旧习。如鹤峰首任知州毛峻德在《劝民告条》中告诫土著居民“要多收草粪,春耕和土为上。要石灰暖地,辟如涧水寒凉”<sup>③</sup>。他又在《劝民蓄粪》中教民蓄粪:“今与居民约:限两月内,远近居民,无论宅之旁后,家家开一蓄粪之池,摭以棘木。若户大人多者,另于空地开纵横各一丈、深一尺,人少者开纵横各五尺,深一尺之池。闲时则捡拾人、畜各粪及烂草灰,堆积池中,至来岁春耕,先挑撒积土和拌土中,然后下种。如此培植,不出数年,土肥地壮,收成倍昔。”<sup>④</sup>

在地力恢复上,武陵农人创造了一些独特的积肥方法,如土家族有压青、打青垫栏和烧火粪等几种。压青,“农人于冬月,满田浸树叶,谓之压青。至春来,叶烂泥融,可以代粪”<sup>⑤</sup>。打青垫栏,即每年发青之时,农民上山割草数捆,置于吊脚楼底层的牲畜栏圈中,不仅可饲牲畜,又是沤清肥。烧火粪,即每年秋冬时节,农民将树枝及杂草堆起,上盖泥土,再点火阴烧。在侗族地区,近处稻田多施人畜粪或者石灰,“远乡不可得粪,则壅草以肥之”<sup>⑥</sup>,并适时薅秧锄草,促进稻禾成长。

## 四、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米的流通与消费

随着稻作生产的发展,稻米产量大幅提高,稻米流通与消费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在流通方面,稻米流通范围更广、方式更多样。在消费方面,食用稻米的人数较前显著增加,但受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稻米消费地理分布不平衡,且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

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的稻米流通以府际、县际流通为主,稻米主要在各府县之间流通,跨省流通相对较少。总的来说,稻米流通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丰歉互济。丰歉互济是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米流通中最主要的一种方式。由于山多田少,许多府县水田“较山地不能什一”<sup>⑦</sup>,稻米产量本就不高,若遇荒歉或兵事,则需其他地区的粮食余缺调剂。省际互济的主要格局是“川米济楚”“湘米运黔”。清代四川稻米长期顺长江东下运往湖广,故有“江浙粮

① 同治《来凤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7)》,第382页。

② 同治《恩施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6)》,第473页。

③ 乾隆《鹤峰州志》,《故宫珍本丛刊:湖北府州县志(5)》,第60页。

④ 乾隆《鹤峰州志》,《故宫珍本丛刊:湖北府州县志(5)》,第59页。

⑤ 同治《来凤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7)》,第463页。

⑥ 道光《晃州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65)》,第160页。

⑦ 同治《桑植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70)》,第49页。



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sup>①</sup>之传统。鄂西南部分州县的稻米即来自川东地区,如巴东县“食米皆仰给川东”<sup>②</sup>。湘米运黔一般先集中于常德口岸,然后水陆兼运,溯沅水而上,经辰州,过沅州,运入贵州<sup>③</sup>。如乾隆二年(1737)三月“自贵州用兵以来,楚省运黔军粮,前后共计四十余万”<sup>④</sup>;乾隆三十五年(1770)六月,“湖南运米十二万石入黔省以救灾平糶”<sup>⑤</sup>;咸丰七年(1857)闰五月“拨湖南辰、沅二府谷仓三万石运赴贵州”<sup>⑥</sup>。府县之间的互济则是最为常见的,也是经常地、普遍地存在的。如湘西地区,沅陵县“虽岁丰,民食苦不给,倚邻境贩运以供”<sup>⑦</sup>;泸溪县“濒溪涧大河田始种稻,所产谷不足供一岁之食,必仰给旁邑”<sup>⑧</sup>;辰州府“所产谷惟溆浦差足,其余厅邑率仰给旁郡”<sup>⑨</sup>;古丈坪厅“定制每年由永顺县拨解兵谷二千余石来厅,保靖之万艾二仓拨来苗兵谷一百八十石,民间以此谷彼此周转,以资其生”<sup>⑩</sup>。从上述史料还可以看出,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的稻米互济,以官府调运为主,商贩转运为辅。

第二,贡奉朝廷。贡奉朝廷是清代武陵民族地区优质稻米流通的主要方式。武陵地区出产不少品质优良的稻米,它们被土司或流官上贡皇帝享用,如鄂西南的长乐冰水稻、利川支罗米、宣恩覃家坪香米,湘西地区的花垣子腊米、永顺颗砂米、城步香禾,渝东南的石碛寺院坪香稻、酉阳花田贡米、黔江马喇湖贡米,黔东北的松桃响水洞白米、印江香糯、玉屏郭家湾贡米等。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长乐县所产之冰水稻、利川县所产之支罗米和石碛厅所产香稻。冰水稻是晚稻的一种,仅产于长乐县白溢寨,主要特点是“粒长味佳”<sup>⑪</sup>,土司时期曾上贡朝廷。支罗米是一种香稻,以产于利川支罗者为最佳,时人称此米“可杂他秈食之”<sup>⑫</sup>。石碛厅寺院坪香稻“惟产悦来寺院。此米呈阴色,晶亮。煮饭时香气扑鼻,馥溢四邻。成饭后,如油拌,糍糯胜过糯米”<sup>⑬</sup>。

第三,米谷贸易。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米的商品化程度普遍不高,商品粮贸易是稻米流通的重要补充方式。从文献来看,武陵民族地区的米谷贸易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而言,稻米输入大于稻米输出。除个别州县外,清代本区大多数地区粮食只能自给或甚不足,故武陵农人多以桐油、茶叶及其他土特产换取稻米,如永顺府王村是清代酉水流域的桐油集散中心,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船桐油下河去,十船大米上山来”<sup>⑭</sup>的谚语。二是以短距离、小规模贸易为主。前文已述,清代武陵民族地区多数州县的粮食输入属缺粮调剂,米谷贸易以集镇贸易为主,长距离大宗贸易并不多见。如澧州石门县所产稻米除供给本县外,多经水路贩入澧州津市,“南乡出谷,县城多仰给焉,道溪板船装送津市,每石较他处取值有加”<sup>⑮</sup>。稻米是集市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如古丈坪厅“赶场货物,则以谷米畜产为大宗”<sup>⑯</sup>。三是稻米大多流入邻近的城市,大中城市成为米谷贸易和中转的主要地点。如石碛厅是渝东南地区的稻米集

①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28,王景灏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21页。

② 同治《巴东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6)》,第274页。

③ 梅莉、张国雄、晏昌贵:《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④ 《清实录第九册·高宗实录(一)》卷39,中华书局,1985年,第701页。

⑤ 《清实录第十九册·高宗实录(一一)》卷863,第19644页。

⑥ 《清实录第四三册·文宗实录(四)》卷228,第45886页。

⑦ 同治《沅陵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62)》,第434页。

⑧ 乾隆《泸溪县志》,《故宫珍本丛刊:湖南府州县志(18)》,第247页。

⑨ 乾隆《辰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59)》,第269页。

⑩ 光绪《古丈坪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70)》,第436页。

⑪ 同治《宜昌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49)》,第436页。

⑫ 光绪《利川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58)》,第58页。

⑬ 乾隆《石碛厅志》,转自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第5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

⑭ 粟元周:《林业谚语》,中国林业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⑮ 道光《石门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82)》,第341页。

⑯ 光绪《古丈坪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70)》,第337页。

散中心,“本境销行岁约二万余石,复由米商陆运至高镇、洋镇、西界沱(镇)、彭水各处,岁约万余石”<sup>①</sup>。

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米消费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一方面,稻米消费地理分布不平衡,部分居住在河谷地带或低山地区的居民以稻米为主食,更多的居住在二高山或高山地区的居民多以大米煮的半熟后,掺入玉米粉,用甑蒸熟成饭,谓之“蓑衣饭”<sup>②</sup>,偏远山民甚至“有终年未食稻者”<sup>③</sup>,直接以玉米为主食。如鄂西南长阳县“临溪者食用稻,山居则多食包谷,间用麦、菽、粟之类”<sup>④</sup>。

另一方面,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米消费的主体为权贵和富裕阶层,普通民众尤其是贫苦人家和偏远山民很少食用稻米。稻米消费存在着明显的阶级性差异。改土归流前,鄂西南容美土司境内有少量水田种稻,“少傅墓在八峰之阳,前临大坪,水田如绣”<sup>⑤</sup>,所产“稻米甚香粒少,与江淮无异”<sup>⑥</sup>,稻米“留以待客,不敢食也”<sup>⑦</sup>。稻米专供土司司主待客之用,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改土归流后,虽然水稻种植有较大扩展,但稻米仍为富裕人家之食物,贫苦人家无力消费。如鄂西南宜昌府“城市多食稻,乡间皆包谷杂粮”<sup>⑧</sup>;湘西龙山县“乡村餐杂粮,番薯菜菔出采取煮食之以果腹,虽富者不常饭稻。近城则以稻为主”<sup>⑨</sup>;渝东南石碚厅“贫民以(玉米)资为粮,罕食稻米”<sup>⑩</sup>。对于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来说,稻米是一种较为珍贵的食物,纵使“家累千金者,仍饭包谷、红韶”,稻米“珍而弗食也”<sup>⑪</sup>。

## 结 语

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改土归流后,伴随着汉族的大量迁入和侗族、白族、蒙古族等散杂居民族的迁徙、流动与定居,武陵民族地区的族际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频繁,并形成了兼具汉族与土家、苗、侗等民族特点的稻作生产技术体系。此外,蒙古族等从外部迁入武陵民族地区的散杂居群体亦融入了这一农耕技术体系,实现生计转型与文化适应,稻米取代奶制品成为主食<sup>⑫</sup>。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形成过程中,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发展促进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使中华民族不断从多元走向一体<sup>⑬</sup>。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经济支柱,而粮食更是族群生存、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武陵民族地区的个案说明,围绕稻米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土家、苗、汉、侗等各族人民不仅共同创造了极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稻作技术体系,更在经济交往中促进了民族交流与交融。当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汲取历史经验智慧,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宣统《石碚厅乡土志》,转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王达等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一种·稻·下编》,农业出版社,1993年,第540页。

② 湖北省宣恩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宣恩县志》,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③ 道光《思南府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46)》,第50页。

④ 同治《宜昌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49)》,第432页。

⑤ [清]顾彩著,吴柏森校注:《容美纪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⑥ [清]顾彩著,吴柏森校注:《容美纪游》,第154页。

⑦ [清]顾彩著,吴柏森校注:《容美纪游》,第87页。

⑧ 同治《宜昌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49)》,第432页。

⑨ 嘉庆《龙山县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41)》,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⑩ 道光《补辑石碚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21)》,第35页。

⑪ [清]搏沙拙老:《闲处光阴》卷下《道光间纪事》,道光二十九年《说库》本。

⑫ 王希辉:《从马背到牛背:散杂居蒙古族社会与文化变迁——以重庆彭水向家坝村为考察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27页。

⑬ 李曦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维度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